

德兴近 50 年出土宋代墓志书风渊流考¹

王德荣

（上饶师范学院书法教育研究所，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江西省德兴市近 50 年出土一批宋代墓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德兴墓志中所涉及的各大望族之间联系密切，十分注重家族外的交往。这些家族重视儒家文化，书法受儒学雅正思想的影响。他们既从书家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李阳冰的作品中取法，又将朱熹中书的书学思想作为艺术追求目标。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朱熹、黄庭坚、苏轼等人对南宋书法的深厚影响。

【关键词】：德兴；碑刻；书风；考证

【中图分类号】：J2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6-0104-07

德兴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赣、浙、皖三省交界处，是设区市上饶市下辖的县级市，该市于南唐升元二年（938 年）设县。德兴市具有悠久的历史。《饶州府志》记载：“德兴南唐升元二年，析乐平、婺源、弋阳三邑地，改邓公场为县，定今治。宋初，仍唐旧制。熙宁中析乐平尽节乡增入，元丰中析弋阳建节乡增入……山峭川驶，银锡山镇，少华独宗。三峰秀出，一掌高擎……风醇俗朴，宋时为江右冠。汪学士记云：士大夫虽万里外，亦知其为诗书之邦。”^{[1]（P146）}又有《德兴县志》载德兴辖区：“东至衢州府开化县界夹阮岭一百一十里，至开化县治一百六十里；西至乐平县界脾岭三十里，至乐平一百二十里；南至广信府弋阳县界洞门关八十里，至弋阳县治一百六十里；北至徽州婺源县界乌石大河二十里，至婺源县治一百里。”^{[2]（P110）}南唐升元二年（938 年），改邓公场置县，取“山川之宝，惟德乃兴”之义，名为德兴县，县治银城，隶饶州。宋隶饶州，元隶属饶州路，明、清两代均隶饶州府。德兴自宋以来便有深厚的儒家学传统和丰富的矿产资源。近 50 年来，德兴市出土了一批宋代碑刻，计有 40 余块，均藏于江西省矿冶博物馆（德兴市博物馆）内，碑文具体展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

从时间上来看，德兴市出土的诸多碑刻主要来自两宋时期，如刊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 年）的《宋胡夫人墓志铭》（楷书，志额小篆），北宋绍圣四年（1097 年）的《宋故寿安县君叶氏夫人墓志铭》（楷书，志额小篆），北宋崇宁五年（1106 年）的《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君墓志铭并序》（楷书，志额小篆），北宋大观元年（1107 年）的《宋故通直郎致仕赐绯鱼袋张公行状》（行书，下文简称《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北宋大观元年（1107 年）的《宋夫人程氏墓志铭》（楷书，志额小篆），北宋政和二年（1112 年）的《宋汪氏墓志铭》（楷书，篆书篆），南宋乾道二年（1166 年）的《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墓碣》（楷书），南宋绍定六年（1233 年）的《宋故通直郎致仕董鸿墓志铭》（隶书，志额小篆）等。

志文内容广泛，涉及德兴当时的人物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习俗。涉及人物诸如董鸿、张焘、李纲、张潜等，多为宋代思想、经济、军事领域的代表人物。墓志书法风格多样，四体皆备，既能看到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李阳冰在北宋的传承，又能看到朱熹、黄庭坚、苏轼在南宋的影响。对于德兴出土宋代碑刻的研究，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1991 年），选编了 1972—1987 年间德兴出土的宋代墓志 3 件，包括《通直郎张潜行状》《将仕郎张由墓志铭》《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墓碣》。该书对 3 件墓志全文著录点校，并考证墓志的作年及墓主、撰文者、书写者的生平履历，但对墓志书法未作分析。孙志刚在陈柏泉的基础上，在《南方文物》上发表《宋汪藻撰文的董鸿墓志铭》，对德兴出土的《宋故通直郎致仕董

¹【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南宋饶州、徽州书法家群体研究”（16YS05）。

【作者简介】：王德荣（1964-），男，江西广丰人，副教授，从事中国书法理论研究。

君墓志铭》碑文全文著录并作简单解读。2003年,孙志刚又在《南方文物》上发表《江西德兴两名碑》,对德兴出土《李纲碑》和《宋炼铜家张潜行状碑》的背景、志文内容及书法作了简要介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近50年德兴市出土墓志的主要内容、各墓志墓主与撰文作书者的交谊进行相关考证,重点对以《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和《宋故长兴县君墓志》等为主的德兴墓志的书法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墓志书风的渊源及流变作出进一步诠释和考述。

一、德兴家族墓志相关史实考略

《德兴县志》记载:“德兴科名盛于宋,胜国以来,代有闻人,或谓青乌之学,德邑雄江右,其大姓若董、若程、若汪、若张、余、祝、姚、傅、钟、李、朱、竺、吴,诸聚族而居。其先人俱择佳水名山于吴、廖,前辈传业近千载,为海内美谈。”

[3] (P1 037)

《德兴县志》提及的董、程、汪、张四姓是宋代居住在德兴的最有影响的家族,被誉为“四大名门望族”,德兴市近50年出土的碑刻多与这四大家族相关,如程氏的《太学程君正思墓表》、张氏的《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焘墓碣》《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而《宋故通直郎致仕董鸿墓铭》《宋董时敏夫人石氏墓志铭》则是董氏家族的,《宋汪氏墓志铭》则属于汪氏家族。这些家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族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尤其是丧葬礼,受到亲友的高度重视。这在德兴碑刻墓志的铭文中有所真实反映,墓主的亲朋好友所作铭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由墓主张潜的外甥万如石撰文;《宋知潼川府侍郎张公墓志铭》中,墓主张根为李纲妻子之曾祖父,墓志铭文出自李纲的幕僚张焘之手;墓主张由的《将仕郎张由墓志铭》由其亲友张潜的好友彭汝霖撰文,而篆刻者张朴则是李纲的岳叔父。

董、程、汪、张四姓家族不仅重视家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往来有礼,而且十分关注家族外的友好交游,以期增广见识,共同提高,如《德兴县志》提及张潜的交游:“乡宫先达,如尚书彭公、侍郎熊公、刘公、侍制程公诸家兄弟,皆总角游从”,“好贤乐士,宾至如归”。张潜后人继承家风,如张显“与董盤涧、程端蒙友,溯程朱子学”^{[3] (P1 035)};董氏家族的董钺与苏轼交好,苏轼有《致长官董侯尺牋》,可见两人的深厚情谊;朱熹与董氏家族有交往,曾为董铎之父董琦书写墓志铭,是为《宋赠迪功郎董公墓志铭》;朱熹还与德兴程氏频繁交往,程端蒙(1142—1191年)建“求放心斋”,朱熹为之题写匾额,程端蒙去世,朱熹执笔撰写《程君正思墓表》和《程君公才墓表》;汪氏家族中的汪藻“幼年已负盛文名。作诗云……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4] (P23)},此处的“诗社”即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因为汪藻平日与黄庭坚的外甥徐俯、洪驹父、洪炎等三人交往密切,故上文“诗社诸公”极有可能即指此三人,从汪藻作诗的风格考察,确是深受黄庭坚创作主张的影响,其作品《浮溪集》中,很多诗作可见其学习“山谷体”的痕迹,如《宿赞侯镇》“微凉初破候虫秋,露草萤光已不流”意境仿黄庭坚《题落星寺》的“小雨藏山客坐久”^{[5] (P228)}等;德兴徐俯与黄庭坚为舅甥,又因爱好诗歌创作,赞同黄庭坚的主张,是江西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黄庭坚对徐俯寄予厚望,在《与徐师川书》中认为“自东坡、秦少游、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5] (P1 162)},徐俯之孙徐通仕幼承家学,其诗作也受黄庭坚诗论的影响,重视“活法、悟入,点铁成金”。

由于德兴望族重视儒家文化,在家族之间和家族之外相互交流,形成了良好的儒学氛围。书法也受儒学雅正思想的影响,既从传统的诸如“二王”、欧、颜、苏、黄的优秀作品中取法,又明显地将朱熹的中正书学思想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

二、德兴出土北宋墓志书法之渊源

德兴市在宋代隶属饶州,饶州湖滨壤肥物丰,家富户美,为江、皖、浙、闽诸省之首,除了拥有渔耕文化、矿产文化之外,还拥有丰厚的儒学文化和移民文化。历代书法大家多曾任职或寓居游历于此,如王庾为鄱阳太守,颜真卿任饶州刺史,黄庭坚曾官饶州余干主簿,王献之、欧阳询、苏轼曾寓居于此。王庾的《祥除帖》、王献之的《鄱阳诸帖》、欧阳询的《鄱阳帖》、颜真卿的《荐福寺碑》《祭濠州刺史》《干禄字书》《鲁公三表》、黄庭坚的《跋欧阳率更鄱阳帖》《跋颜鲁公祭濠州刺史》

《此君轩》等都与饶州相关。德兴出土的《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宋故寿安县君叶氏夫人墓志铭》《宋故将仕郎张公墓志铭》《宋故寿昌县太君程氏墓志铭》《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墓碣》《宋汪氏墓志铭》《有宋龙图张公行状》《宋故通直郎致仕董鸿墓铭》《宋故长兴县君墓志铭》《宋故徐通仕墓志铭》《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等墓志的书法，明显地受到《唐怀仁集字圣教序》和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人书风的影响。

如《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墓志刊于南宋靖康元年（1126年），志文为墓主张潜的外甥万如石所撰，洋洋数千字，竖有行，横无列，行书。碑文书法艺术极高，整体布局得当，明快流畅；取法“二王”神韵，虚立映照，动静相交；结体婉丽流美而筋骨分明，形态变化多姿而气势连贯；富有极强的节奏感，给人以隽秀飘逸、飞动通灵之感。此墓志的出现是南宋继续承接唐、北宋以来王羲之雅正书风的有力证明，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北宋建立之初，一切皆在草创之际，书法可视为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唐太宗以帝王之尊在《晋书·王羲之传》中亲自为王羲之写赞辞，并云：“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6] (P122)}将王羲之推上了“书圣”的地位。唐代经过帝王大力提倡，王羲之成为书法正宗，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极大，以至于有唐一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徐浩等，无不从王羲之这里汲取养分，为己所用。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正统性，他说：“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7] (P512)}项穆把王羲之对于书法的地位与孔子之于儒学的地位对等来看待。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雅正一脉：“逸少一处，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采悠焕，正气奇萃成也。”^{[7] (P525)}王羲之的真迹历经南北朝战乱，至唐只字片纸便可奇货可居，千金难求。据何延之《兰亭记》载，《兰亭序》当时为辩才和尚所藏，太宗数求而不得，便派御史萧翼从辩才处骗来。太宗为一国之君，欲得《兰亭序》真迹，其手段竟也是使萧翼从辩才处骗得。此事虽不足为信，但足可反映王书的难求。皇帝尚且如此，一般的士人学子想要得到王羲之法帖，难度更可想而知，故《唐怀仁集字圣教序》应运而生。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由京师弘福寺僧怀仁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书写而成《唐怀仁集字圣教序》。此碑的出现以及拓本的传播对后人学习王羲之书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代自李世民以后，历任君王莫不醉心翰墨，对王羲之青睐有加。《宣和书谱》记载了唐代帝王学习王书的情况。如唐代宗李豫“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还，世相祖袭，至代宗家学未坠。论其笔力，则非有太宗明皇超迈之气”^{[8] (P10)}。德宗对于“群臣章奏来上，皆即批答，笔无滞思，翰墨落落可观……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8] (P11)}。至德二年（757年），寿王李瑁书《寿王第六女清源县主墓志》，字体婉丽工美，颇有王羲之行书的风范。

综上所述，工于王羲之一脉的书风是唐代帝王的共同特点。王羲之的行书以其妍美流便而深得人们的喜爱，加上唐代帝王们的推波助澜，使之得以迅速推广。肃宗朝翰林待诏刘秦以擅写行书出名，刘秦所书《刘奉芝墓志》全从《唐怀仁集字圣教序》出，又参以唐楷的结构，丰腴开阔，颇具大唐气象。贞元年间，翰林学士吴通微、吴通玄，宰相王绪等人也取法《唐怀仁集字圣教序》，翰林院中人多仿效他们的书迹，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行的流派——“院体”。“院”乃翰林院之简称。唐玄宗开元初于宫中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因中书省事繁剧，乃选文学之士为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设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机密文件）。所以，翰林学士不仅长于词学，而且擅于书法。作为近臣，他们是最了解皇帝审美趣味的人，其书法风格也多与皇帝保持一致。且不管宫廷之外的书风如何变迁，皇室之内这种崇王的书法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种书法风气经历五代一直延续至宋初。

宋替代后周，太祖赵匡胤基本上继承了后周的政府机构。后来，赵匡胤诏告天下建三馆，曰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用以宣扬教化。书诏的缮写工作必然会受到皇帝和政府对于书法极大的重视，而翰林待诏们则是写书诏者之中的翘楚和学习楷模。翰林待诏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其书写风格成为缮写书诏的模式，因为对政府机构中抄写文件的胥吏而言，工作效率和美观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经过怀仁精心集王字而成的《唐怀仁集字圣教序》，最适合于写书碑和志。从《唐怀仁集字圣教序》面世到宋初，近3个世纪里，走马更迭的是王侯将相，而书写工作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到宋初，出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和政府的需要，文人官吏自然更加重视学习《唐怀仁集字圣教序》。至北宋初年，由朝廷翰林待诏张先振奉敕书的《任公屏盗碑》便是一例，之后在北宋一朝书写碑志时一直延续了此种雅正的风气，南渡以后这种雅正的书风也一直得到继承。德兴出土的《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墓志的书法风格与“二王”一脉的高度吻合便是直接证据。

再看《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通篇书法，此志明显取法唐初所拓怀仁和尚《唐怀仁集字圣教序》，从此志结字、用笔与之进行分析对比，书风与其一脉相承，清晰可见，如图1和图2。



图1《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图2《唐怀仁集字圣教序》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图1为《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墓志，图2为《唐怀仁集字圣教序》。先从“为”字进行分析。该字第一笔为一个向右上角度挑起的斜点，完成此点之后紧接着作向左下写成一个斜撇，这两个笔画中间并不断开，有所牵连。观图1和图2，笔法如出一辙。“为”字最为主要的笔画即是三个相互平行排列的横折笔画，正是有了这三笔的以此排列，此字基本的间架结构才得以构成。观这两块碑中的同一字高度一致，甚至连笔画之间的分间布白的空间都相同，这也说明从笔法的继承方面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为”字的最后一个笔画可作四个点，亦可写成横画，在这个笔画的处理上，两字又都作了相同的处理，说明两者之间在用笔和架构之上是有继承关系的。接着再看第二个“方”字。此字为一个独体字，笔画比较少，仅为四画。先作一点，点画写完之后是一个从左下到右上倾斜的长横。从两者的字形上来看，点画在处理的时候方向角度略有不同，但势态较为一致，长横的倾斜度也相同，笔画与笔画的气息连贯得比较好。之后就是写撇和横折钩的书写。撇起笔较重稍微停顿之后轻轻撇出，横折钩和撇画之间的搭接处呈现90°的直角。对比这两处的处理，可以看出两者高度契合。

图1和图2中，第三个排列的是“其”字，第一笔为一个短横，略微地向右上倾斜，紧接着是两个相互平行排列的竖画，第二竖的落笔处比第一横高出不少，之后是两个小的短横。此两横把里面的空间平均分割，呈现出三个布白均等的空间。写完之后是这个字的主笔，一个长横把以上的笔画统统拖住，稳妥有力。最后是两个相互呼应的小点，左低右高，顾盼生姿。观图中两字的用笔和结构，均能清晰地看到《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碑师法，或者说是学习的源头，确实在《唐怀仁集字圣教序》之上。

第四个字是一个“萬”字，首先需要写的是一个草字头，分四笔写成。这四个笔画的书写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并且笔画相互连接，成笔断意连之势。观上下两字的草字头，气息贯通，同出一脉。紧接着便是中间部分田字框的写法，写完之后在下面写作一个小的短竖，之后顺锋起笔作横折折钩。写到这个笔画时，此字大的间架结构便较为完整地勾画出来。最后在字的中心部位通下来一个长竖，写就之后，用一短提或者是点收笔。看这两字小的笔画到大的间架结构，均高度契合。

图1和图2中最后一个字为“是”字，可以把此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进行对比分析。上部位为一“日”字，先作一短竖，之后是横折，相同的是两字竖和横折搭接的地方都留出少量空白，然后是两个横画的书写。下半部分第一笔作长横，非常有力

度，接着从长横的中间位置向下写作竖画，竖画的右侧作一个撇点，左侧作一长撇，写完之后顺着笔势带出最后的平撇。观图 1 和图 2 中的两个“是”字，笔画与笔画之间相互映带，简洁明快，一气呵成。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兴出土的《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墓志的书法受唐初所拓、怀仁所书《唐怀仁集字圣教序》书法风格的影响，当为王羲之一脉雅正书风在南宋德兴广为流行的力证。除《宋赐绯鱼袋张潜行状》墓志以外，刊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 年）的《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墓碣》中的书法，与唐代欧阳询楷书风格相类，笔法内掖，结字内紧外松，瘦硬通神，也应受到了“二王”一脉雅正书风的影响。

由此显见，德兴近 50 年出土墓志的书风除受上述“二王”一脉书风的影响之外，还有不少墓志的书法或取法苏东坡，或取法黄庭坚，或直接从汉隶中来，墓志篆书铭文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图 3《宋故长兴县君墓志铭》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如图 3《宋故长兴县君墓志铭》中，“试”“君”“墓”“当”“感”“寒”等字，观其用笔明显取法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一类风格，结体呈扁形偏矮，并将字的重心下移，体势向左倾斜，用笔中侧并用，戈画弯曲明显，这都是较为突出的苏体的写法。而在图 4《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墓志中，字体则法尚黄庭坚。如图 4 中的“学”“寻”“寿”“馆”“彭”“当”“难”“遂”字，结体奇侧紧缩，长波大撇，一波三折，长枪大戟，绵劲迟涩，绝类黄庭坚的《朝夕相会帖》《致齐君尺牋》尺牋风格。冯班在《钝吟书要》中云：“黄山谷纯学《瘞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道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高，故道健而不俗。”^{[8] (P11)}此墓志中的书法略俗，点画中段动作较黄庭坚更加简单化，结体未若黄庭坚深稳，但从具体字的笔画、结构上来看，并不影响其师法山谷书法的事实。



图 4《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还有刊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 年）的《宋故通直郎致仕董鸿墓铭》（图 5），与司马光的隶书《王尚恭墓志》（图 6）相类，同样取法汉代的《张迁碑》，古朴简明，气息醇厚。该墓志的隶书呈现出方整的一面来，横画的起笔处多藏锋，调整好笔锋之后轻轻提笔，之后在收笔处又加重收笔，一波三折，隶意高古。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隶书逐渐退出中国实用书体之后，依旧在此墓志铭的书写中能见到如此佳作，实为不易。



图 5 《宋故通直郎致仕董鸿墓铭》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此外，德兴墓志中所见篆书有刊刻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 年）的《宋胡夫人墓志铭》、刊刻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 年）的《宋故寿昌县太君程氏墓志铭》、刊刻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 年）的《宋汪氏墓志铭》。它们或取法秦代李斯小篆，或取法倒薤篆，或取法唐代李阳冰玉箸篆，均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用笔沉着安稳，结构左右对称，线条粗细匀一，具有浓厚的装饰性，给人以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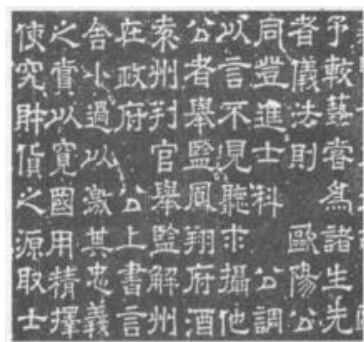


图 6 《王尚恭墓志》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宋代德兴书法的渊源传统，宋代德兴书法既有晋唐王羲之的一脉书风，也可见北宋苏轼、黄庭坚书法在德兴的传播与接受。

三、德兴出土南宋以降墓志中所见朱子书学思想的流变

细致地比对德兴书法，无论楷、行、篆、隶，都呈现出独特的端正平和之雅正风致。这种端正平和的气质在朱熹的《太学程君正思墓表》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如图 7 中的“绍熙”“邪正”“讲学”“为难”“分别”等字，是钟繇和“二王”楷法的杂糅快写，结体端正平和。钟繇和“二王”的纵横体势在此表中荡然无存。



图7 朱熹《太学程君正思墓表》

图源：江西德兴矿产博物馆

这种书法气质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其论书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理学书家论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重功用；二是重性情。所谓功用，即书以载道，宣扬笔正则心正。朱熹受“二程”循旧守法以及其父偏好古风的影响，书学秉持书教，要求写字必楷敬端正，反对奇侧狂媚。宋四家独推重蔡襄，认为其楷书真正，温润敦厚。对苏、黄、米意造书风的刻意为书、奇险雕琢及变体书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9] (P96)}所谓重“性情”，要求书法规约性情，尚儒家温柔敦厚、从容优雅。如朱熹论称赞王羲之十七帖：“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9] (P4 322)}朱熹认为，今人学不入规矩的书法，根本原因是内心杂躁，不虚静，其理据是：“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9] (P4 322)}他在《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中赞扬欧阳修为人安静和豫，故所作手札温润娴雅。批评王安石性情躁扰急迫，故所作书倔强无润。朱熹曾在德兴进行过重要的讲学和游历，其出土的墓志书法中可见其“中正”书学思想的影响。方爱龙在《南宋书法史》中讲道：“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十二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这一趟来浙东，对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的促进是巨大的。浙东之行，朱熹不仅考察了书法圣地兰亭，而且大量获观了钟繇、王羲之等人的法书名迹，打开书法上的眼界，从而使自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直接定位到晋唐名家名迹上”^{[10] (P175)}朱熹的书学思想直接受钟繇、王羲之正统书风的影响，德兴出土的朱熹《太学程君正思墓表》中可见他的书法从钟繇和“二王”中取法，亦可见朱熹书学思想在书法上的实践。故这些出土的资料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还对南宋书法的研究有所裨益。

朱熹的这些书学思想通过书院的书学教育在饶州传播开来。宋代德兴有书院12所，占整个饶州的1/4，朱熹曾在德兴延福坊的银峰书院讲学。据《宋元学案》载，朱熹要求学生：“写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倾。几席必整齐。位置有伦，简帙不乱，书笥衣篋，必谨。”^{[11] (P329)}书法必须端敬不可欹倾，生活也必须保持这种态度。朱熹的学生如程思正、程珙、程鼎、王过、王亿、余芑舒等也在德兴书院讲学。程思正在德兴游奕坞双桂书院讲学，程珙在德兴十都柳湖书院讲学。程鼎在德兴八都柳湖书院讲学，王过在拙斋书院讲学，王亿在四勿斋书院讲学，余芑舒在息斋书院讲学。作为晦庵儒学续传，这些学生将朱熹中正平和的书学思想传播下来。德兴近50年出土的这批宋代墓志多涉及当时主要的几大家族。这些望族之间交往频繁，多重视儒家文化，注意家学的传承。从思想上来看，他们多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的《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墓碣》（楷书）墓志中记载了墓主张焘，他“与董盤洞、程端蒙友，溯程朱子学”，墓志的铭文中直接言明他“溯程朱子学”，便可以直接看出张焘的学术渊源。从书法风格上来看，德兴出土的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的《宋星子县主簿夏公迪公墓志》，用楷书入碑通篇法度严谨，端庄秀丽，敦厚可人，显示出了书丹者深厚的楷书素养。朱熹讲“写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倾”，此墓志的书法所具有的风格特征正是受朱熹书学思想的影响。书丹者崇尚楷书，志额和墓志正文均用楷书书写，一笔一画皆可见法度，无懈怠之意。另外，朱熹“中正”的书学思想在德兴出土的明清墓志中亦可得见。如明成化七年（1471年）的《明故张母昭十八孺人邵氏墓志》以及清咸丰十三年（1857年）的《清尚定公烈女墓志》等，墓志书丹的书体均楷书，书法风格同德兴南宋时期的书风一脉相承，中正平和，不激不励，足见朱子书学思想在德兴的流变和传播。

四、结语

由上可知，德兴墓志书法既直接受“二王”一脉典型书风的影响，又有“二王”以外如朱熹、黄庭坚、苏轼诸多书家的风格特点，并可见朱熹书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出土的墓志资料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文献参考价值，对宋代德兴人物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习俗有研究价值，而且对宋代书法研究有所裨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饶州府志[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 [2]孟庆云, 等. 江西省德兴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6.
- [3]德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德兴县志[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 [4]张世南. 游宦纪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郑永晓. 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6]李世民. 晋书·王羲之传[G]//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 [7]项 穆. 书法雅言[G]//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 [8]佚 名. 宣和书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9]朱 熹. 朱子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0]方爱龙. 南宋书法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1]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全祖望, 补修; 陈金生, 梁运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